中国现当代民粹主义思潮发展及其原因探究

周思睿 2013201483

民粹主义思潮是当代中国重要的思潮之一，其以“人民”作为自身行动的外衣，以“全体人民的意志”作为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当代中国的民粹主义思潮既有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也有现实因素的推动，同时也与新媒体的发展密不可分。

1. 民粹主义及其特点

要研究当中国民粹主义思潮就必须要先明确何为民粹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特点，民粹主义首先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与俄国，以平均地权为主要政治诉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粹主义广泛存在于五大洲，以拉丁美洲和阿拉伯地区的民族复兴为最重要代表；九十年代，民粹主义再度形成高潮。

民粹主义实际上不同于类似自由主义等“元思潮”，它的概念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最重要的原因是民粹主义既是一种社会思潮也是一种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政治策略，当用不同角度看待其是，便会得出不同结论。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它极端强调普通群众的价值和理想，将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一切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并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直接否定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当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时，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将普通群众作为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从根本上否定精英的作用；而作为政治策略时，其则强调动员大众去参与政治进程，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动员。由此，作为社会思潮的民粹主义，其可以定义为：反对精英统治，以普通民众价值取向为准，全体人民的意志才是合法性的来源。

民粹主义实际上伴随着现代化而来，起有强烈的反市场以及反现代化倾向，当现代化出现薄弱环节，比如社会分化、贫富分化、经济危机时，它就会应运而生；此外民粹主义也与短期政治与经济利益相关，当国家面临政治危机时，民粹主义的政治口号也能在短时间内动员大众，将其纳入政治过程，以此获得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但一旦动员其民众又不能满足其要求，则也有可能会走向极端的民粹主义。由此，与其说民粹主义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不如说它是一种超意识形态和超政治体制，民粹主义更像是一种“政治涂料”，它可以俘获其他的意识形态乃至政治体制，当合理运用时可以造福国家，但一旦走向极端也会危害社会。

1. 中国现当代民粹主义思潮及其简要发展

中国的民粹主义思潮深受苏联影响，1912年列宁发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以“五四运动”为界，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民粹主义第一次大规模的爆发，民粹主义总是伴随着民族主义而来，当中国作为战胜国却依旧难以保国保种，备受欺凌时，民粹主义首先便与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来越发严重的激进主义所结合，这种愈发严重的民粹主义不仅表现在思想领域上，更表现在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各阶级都被广泛的调动起来，这也无疑促进了在当时同样带有激进色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

建国前后，中国的民粹主义思潮迎来了第二次大的爆发，在建国前后，以争取平均地权为核心的民粹主义思潮诉求实际上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一度盛行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本质还是在社会变革之际，小农经济的集中体现，与20年代由知识分子、先进阶层所动员起来的民粹主义不同，这一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明确的拒绝了这种意图跨越社会主义阶段而直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入共产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潮，无论是在七大还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都不止一次的要求反对民粹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实践便可看做是对这是民粹主义最为有力的遏制。

自大跃进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的民粹主义思潮迎来了第三次爆发，这一次的民粹主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是领导阶层乃至毛泽东本人直接发起与动员的，在频繁的政治运动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将政治运动的苗头指向了“走资派”，实际上是整体的官僚阶层。长时间的全民总动员实际上难以在政治制度内做到，而普罗大众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也自然的形成了非理性的大众意识，实际上被一部分领导者所利用，由此民粹主义在这一时期的集中爆发更多的带有高级领导层自上而下的鼓动特点。

在近十年特别是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兴传媒快速发展以来，中国的民粹主义思潮实际上形成了第四次大的爆发，当代的民粹主义其社会根源很多是现代化所必然带来的问题，诸如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权力固化、贪污腐败等等，但不可忽视的是，自媒体的发展极大地激发了民粹主义，它第一次使得民众可以有渠道去掌握话语权，以舆论的力量去肢解精英的各种论述，同时，新媒体快捷方便的特性也极大的方便了传播，而这种虚拟空间中的语言也使得大众不易形成理性的思考，冲动而又非理性的网络意识特点使得民粹主义在新媒体快速发展后得以飞速的传播。

总的来看，在大约一百年的时间内，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有过至少四次大规模的发展，其既有共性也有区别，共性是都以民众的意志作为衡量事物价值的重要尺度；在历次民粹主义的泛滥中，反建制也成为主流，实际上反映了民粹主义与“五四运动”以来越发严重的激进主义的合流；而区别也显而易见，“五四运动”前后的民粹主义以及“文革”时期的民粹主义，更多的带有自上而下，由掌握话语权的精英阶层或者掌握国家政权的官僚阶层所发动，而建国前后以及当下的民粹主义思潮，则更多地带有自下而上，由草根阶层发动的特点。

1. 当代中国民粹主义思潮及其特点

当代中国民粹主义思潮重点表现为普通民众特别是草根阶层仇官仇富，敌视精英，对于社会的精英阶层特别是官员、体制内学者、资本家等秉持着不信任乃至一边倒的批判态度，具体主要以网络空间内的批评、批判、嘲讽乃至捏造事实以及现实中人身攻击、人身骚扰等为表现形式。

尽管当代中国民粹主义思潮其策源主要是普通群众以及草根阶层，但其具体立场实际上也有“左”、“右”之分。左翼的民粹主义思潮主要萌发于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年龄较大，大多生活窘迫，社会地位较低，在改革开放之前，其享受着国家制度带来的保障，但历次改革使得其利益受损，由此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核心问题是“修正主义”，即资本俘获了权力，利益被少部分资本家所获取而普罗大众受到损失，左翼的民粹主义者在政治思想上仇富甚于仇官，总体上他们相信国家形势是向好的，高层领导是一心为民的，但认为与自己直接打交道的官员都是坏的，呈现出了一种“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潮流，在他们周围，都是具体权力的专横、腐败，但他们仍拥护抽象的权力模式，在经济上，左翼的民粹主义思潮实际上有着极强的“平均主义”残留，大多有“民不换穷而患不均”的理念；在对外关系上，左翼民粹主义者大汉族以及民族主义高涨，敌视甚至仇恨一切“外来势力”，有着极强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价值观念。而右翼的民粹主义者则与之相反，其年龄构成相对年轻，成长与物质富足的年代，很多并不依靠体制生活，有着相对较好的个人收入与社会地位，在政治上，其仇官甚于仇富，他们之所以仇官，并非只仇恨具体的权力，而是仇恨背后专横的体制，他们攻击具体的官员，更多是要证明权力体系之恶和政治变革之需，右翼的民粹主义者大多标榜西方的民主自由，认为中国的核心问题在于专制的制度与公民社会的弱小；在经济上，与左翼相对，他们更加鼓吹完全的市场模式，企图利用资本的力量来限制不受控制的权力；在对外关系上，右翼的民粹主义者普遍较为向往西方的民粹主义制度，经常以外国的好来衬托中国的坏，核心还是迫切的希望变革制度，获得补偿性、甚至报复性的“正义”。

 事实上，无论左翼右翼，当代中国的民粹主义思潮都带有极端平民化的色彩，都以代表所谓全体人民自居，然而这种民粹主义思潮实际上崇尚的是作为抽象意义的人民，其对个体实际上呈现极端排斥，当代中国的民粹主义思潮也极易以各种“政治正确”的观点作为包装，实则核心则带有一种“流氓无产者”的心理。

1. 当代中国民粹主义思潮原因分析

驯服民粹实际上成为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领导者孜孜追求的目标，回顾当代中国的民粹主义思潮，既有自五四运动以来一直徘徊的激进主义的影响，也有建国后平均主义的泛滥，同时与新媒体的发展密切相关，总的来看中国古代传统及社会状况、作为民粹主义反对对象的精英阶层自身的不检点、精英统治下的利益表达渠道以及网络的快速发展这四个原因，共同诱发了中国当代民粹主义思潮的泛滥。

1. 、古代传统以及自身社会情况

民粹主义本身强调人民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民粹主义思潮得以在当代中国兴起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古代“平均主义”的价值残留。

作为小农社会，中国自古以来便强调“民本”思想，而“均贫富”则一直是底层民众孜孜追求的梦想，小农社会本身财富掌握也较为分散，由此至近代逐渐演变成“在小生产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绝对平均的思想”，而中国古代也强调“重义轻利”，加之一直以来的“大同梦”，都获得了中国中下层民众以及富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的推崇，由此，当近代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之时，除了强国之外，避免资本主义痛苦的“大同梦”思想实际上一直活跃于社会，由此中国古代的“平均主义”以及“大同”思想实际上沟通了近现代的民粹主义，对民粹主义思潮的演变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近代以来，俄国民粹主义也传入中国，由前所述，尽管七大以及建国初的纪念，毛泽东不断强调反对民粹主义，但实则批判“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三大改造”的快速完成、“大跃进”乃至最后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际上都是中国古代平均主义思想以及近代俄国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在毛泽东时代的映射，此外，毛时代频繁的政治斗争使得国家经常通过人为的制造“敌对阶级”来鼓动全体人民参入政治进程，这种人为制造的仇恨使得民粹主义不断发展，其惯性延续至今。

由此，古代长期以来的“民本”、“大同”思想，毛泽东时期的绝对平均主义等思想都是诱发中国当代的民主主义思潮的重要原因。

1. 、部分精英阶层自身行为的“不检点”

民粹主义思潮实际上指向性非常明显，在当代中国，官僚阶层、体制内的学者、资本家都可能是民粹主义思潮批判的对象，同时民粹主义的泛道德化非常严重，其有一味的妖魔化精英阶层，认为民众都是真理的化身的趋向，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作为国家与社会统治者的精英阶层确实有其不检点的一面，而这也往往成为民粹主义爆发的缘由。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经济的市场化，实际上率先投入市场的是体制内无法解决工作的诸如劳改、无业游民等人员，尽管现在情况得以扭转，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存在着体脑倒挂的情况，而先富起来的人更多是社会的底层人员，其本身素质较为低下，这就使得“为富不仁”的思想深入人心；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公务员体制管理的落后也使得公务员队伍的社会声望并不好，两者存在的客观基础使得一旦有涉及类似精英群体情况的发生，就会激发强烈的民粹主义。

精英阶层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基本道德素养问题，如生活作风问题已经成为官员落马的重要因素，而类似事件的发酵程序是“网络曝光—民众关注—相关部门介入—宣布处理结果”，纪检部门实际上在很多涉及官员腐败特别是生活作风问题上无法很好的预防与查处，网络曝光成为这类事件的先导，这种由网络亦或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强大的舆论压力实际上间接加深了民众对于政治精英阶层的不满，而且不仅不满于具体官员，更是不满于整个权力执行与制约机制，无疑这就加剧了“仇官”的心态，毫无疑问不少精英阶层人员缺乏与之地位相匹配的道德标准，而不够完善的监督制约体制都使得民众不满于现状，这就自然使得民粹主义的思潮得以酝酿爆发。

二是部分精英阶层的违法乱纪，如果说道德层面更多牵扯的是个人，则精英阶层的违法逻辑特别是官员的贪腐就更会引发大众的极端仇视，实际上传统的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发酵恰恰就是由于官僚阶层的违法乱纪问题，正是由于对其的不信任才有了俄国巴枯宁的民粹主义运动，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全球的左翼民粹主义思想也主要是要反对旧的、贪腐的官僚阶层。在中国这类的事件也频有发生，小到官员的烟、表等配件，大到诸如周永康等国家级领导人的贪腐问题实际上就严重的激发了大众的民粹思想，而层出不穷的腐败问题，使得民众由对具体官员违法乱纪的憎恨转向了对整个官僚体系与官员的不信任，这也必然激发民粹主义思潮的产生。

1. 精英统治过程中的民意表达渠道受阻

民粹主义思潮之所以在互联网以及新媒体发展后得以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精英统治过程中民意表达渠道的受阻，由此民意不得不诉诸于自媒体，但这种渠道毕竟不是正常的政治进程，也很难被纳入到政治进程当中，而历史上各次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都与民众利益表达渠道的受阻有关。

在当代中国，大众关注的切身利益问题诸如食品安全、土地征用、环境污染、司法公正、腐败特权等等，而民意输送的渠道则主要是“两会”、“内参”、“信访”、听证会、恳谈会等等，但总的来看，这些渠道的制度性不强，代表性也较为有限，难以被群众所广泛认可，由此导致广大底层民众在面临问题时，总是选择进行非制度化的抗争，如网络曝光、群体性事件等等。此外，政府传统的维稳思维，使得在普通民众面临问题时，更倾向于将事件闹大，最后以政府给与更多补偿息事宁人而告终，实际上这种民众的抗争一方面确实反映出社会存在的客观矛盾，但同时也进一步调拨了民众的极端情绪、激化了社会矛盾。

1. 网络的推波助澜与网络引导的严重滞后

 网络的发展本身就带有民粹主义的倾向，从技术角度，网络本身关注的是个体，其是一个以个体为中心的聚集过程，而网络所具有的几个特性则更加剧了民粹主义的发展。

其一，网络具有平等性，在传统的报纸、电视等媒介上，能够经常抛头露面的都是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等精英人员，而普通百姓则缺乏话语权，但网络的快速发展以及自媒体的普及从本质上颠覆了这个传统，首先，网络的非中心性使得主流意识形态与权威媒体垄断话语权的情况被大为改观；其次，网络的虚拟性缩小了网络中个人的身份以及地位差异，每个人都拥有近乎相近的平等的话语权。

其二，网络具有较强的偏激性，这大大推动了民粹主义的发展，首先，这与网民的特征有关，网络上虽然涵盖了各个阶层、身份、年龄的网民，但主要的群体还是年轻化与平民化的青年，由前所述，青年人天生的有着后现代的价值倾向，而网络则成为青年表达观念的最重要平台；其次，网络是一个虚拟的、开放的和平等自由的空间，而情绪化的话语无疑在网络上更有感染力，这种群体性的思潮正如“乌合之众”一样，会带有群体性的无意识与偏激。

除了网络的特性使得民粹主义思潮得以发酵之外，网络舆论的引导工作也相对滞后，对网络引导的不重视或者不到位，不仅有的时候无法缓解网络上的民粹主义思潮，更有可能间接起到的推泼助澜的作用。

我国现当代网络引导之后，主要表现为舆论引导法制化水平、具体技术性手段等方面的滞后。如我国针对网络舆论的立法进程相对滞后，也缺乏完整的网络舆论监督体系，这使得当网络上出现极端言论时，网络舆论的管理几乎等同于删除这些极端言论，而这种方式也极易被认为是欲盖弥彰，反而更多的加深了民众的不信任。此外，针对网络舆论引导人员的相关人员水平也有待提高，这都影响着网络引导的实际效果，自然也没法消弭网络上的民粹主义思潮。

网络之于民粹主义思潮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过这种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方式去肢解乃至否定了有经营所构建的话语权，网络上传统精英话语权的弱势以及普通草根阶级话语权的强势反映到现实中，则更加助长了民粹主义思潮的生发。

参考文献

1. [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 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
3. 陈龙，《网络民粹主义潜流的栖居空间》，《人民论坛》，2013年第6期
4. 杨鹏，《民粹主义与中国未来》，《学习博览》，2007年第4期
5. 陈曼娜，《中国传统民粹主义和民本主义中的士人角色》，《湖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6. 李伟，《关于国内民粹主义研究的几点讨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1期